

古城旧事

岁月留痕

成石

远去的代笔先生

彭哲

我曾从事文秘工作,所以时常为人代笔,但从未索取报酬。前不久,同学老贾打电话,要我为其千金的婚仪上写一篇讲话稿。一时间,我便联想到昔日的代笔先生。

所谓代笔先生,多是职业代写书信的人。早年间,为人代笔是一种职业,旧时称“捉刀”“师爷”,近代则称为代笔先生,既显得文雅、好听,还有几分恭维之意。过去人们的文化水平普遍低下,文盲也多,许多人说起来一套一套的,但“斗大的字不识一筐”,提笔如扛鼎,尤其是写家书或情书,那只有请人代笔了,于是代笔先生应运而生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城市尤其是小县城里的邮电局门口,都有代笔先生设点,可谓是城市的一道风景线。他们的家什很简单,一张小桌、两条长凳、信封信纸和一支钢笔。也有在火车站或长途汽车站设点的,方便老年人一下火车,花个一两角钱给家里报个平安。他们以笔代耕,以笺代田,辛勤地养家糊口。

代笔先生多是男性老者,他们胡须飘拂,不苟言笑,衣着虽然简朴,却也整洁得体,戴一副眼镜,给人一种稳当靠谱、学问高深的感觉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,我家住城坊街东口,出门拐弯朝北数百米便是太原市解放路邮电局。邮电局南侧是有名的建筑工人俱乐部,二者之间就有一位瘦削高挑的代笔先生坐摊。我常到那里玩耍、蹭电影,听爷爷称呼他为“侯先生”。侯先生胡须长白浓密,颇有几分松形鹤骨的风姿。

听爷爷说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,侯先生念过几年私塾,有点古文功底。他写信时,文白相杂,行文流畅。一旦有了生意,侯先生先侧耳倾听,问清来龙去脉,理会顾主意图。尽管有的来者絮絮叨叨、啰啰嗦嗦,但侯先生自始至终一副恭谦和蔼的模样,待到顾主喘气口歇之际,他便将其内容归纳总结,复述一遍。得到认同,便笔翰如流,一路写来,不打底稿且一字不差。最后再念一遍,便大功告成。

侯先生不但文笔好,还是个戏剧票友,他念起信来不仅抑扬顿挫,徐疾有致,还带点戏腔戏韵,蛮吸引人的。每当侯先生念信之际,总要引来一些路人驻足观看和聆听。不过也有例外,碰到了情书,那声音自然要小了,否则人家要害臊的。我那时也经常站在一旁听他念信,感觉很有意思。

与多数的代笔先生“守株待兔”一样,侯先生也是坐等客来。没有生意时,他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,是端坐的,不抽烟,不蹑二郎腿,一派“虎老雄心在,人老精神爽”的模样。

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全民文化的普及和提高,上世纪70年代初期,不会写字所造成的交流障碍在城市里已基本不复存在,代笔先生的职业也就悄然退,那曾经慢节奏的书信往来也就渐渐地留在了记忆长河之中。



往事钩沉

老师给我改志愿

李成林

那年,我的高考志愿被老师改了,我非常感激。

我是上世纪80年代参加高考的。考完之后,我就赶到学校去填报志愿。我家承包田多,母亲常年有病,父亲就曾对我说:“今年若能考上,你就去上学。若落榜你就下地劳动吧。”当时是估分填报,我面对着志愿表,不知填什么学校。我坐在校园的亭子里,思考了一个早晨,最后我填上了一所工业院校。

等待中,录取通知来了,我考上的是本省的师范大学,这所学校的录取线是360分,我的成绩是400分,整整高出了40分。我兴奋地拍手叫好。从小学一直到高中,我的梦想就是长大成为一名老师。现在终于梦想成真了。

我把录取通知书揣进衣兜准备离开,这时班主任蒋老师叫住了我:“你的志愿,我——”没听完他的话,我猛地惊醒了:“啊哟,我的志愿怎么变了,原来我填的是工业院校

呀。”

蒋老师吩咐我坐下:“那天你报了志愿回去后,我猜你怕自己分低,报师范大学考不上,所以就填上了不喜欢的院校。我和几位老师商量了一下,都认为按你的实力,报师范是没问题的,所以我就私自把你的志愿改了,因时间太急也没跟你沟通。现在,你满意吗?”我使劲点头:“老师,这太好了。”

蒋老师接着又道:“其实,人做事要自信,要相信自己,不要把自己看得过低,有时也要赌上一把,这样也许会少些遗憾。”

大学毕业之后,我如愿走上了教育岗位,因为是喜爱的职业,我锐意进取,热爱学生,我的教学获得了家长和学生的称赞。

我庆幸,这辈子遇到了能够了解学生的好老师。

乡土记忆

乡下放驴记

梁建军

小时候,回乡下过暑假,常常要在生产队参加劳动,下地、割草、放牲口,都是中小學生田间劳作的项目。

夏日里,村里的骡马等牲畜也仿佛进入“暑假”,用牲口的衣活少了,骡马牛驴就在圈里,不干活还要吃草料。这时,生产队就让社员们“放牲口”,就是放牧。放牧多是中小學生们的事情,奶奶和生产队里一说,我也加入了放牧的队伍。小后生们放马、骡子、牛。我看到这些庞然大物,马蹄踏踏作响,牛角一翘一翘,心里就发怵,不敢近它们的身子,只敢壮着胆子放小毛驴,工分也要少一些。

出工的时候,就到生产队马厩里牵牲口。我拉着驴的缰绳,跟着放牧的孩子们向村外的东山坡上出发,那里有块坡地,不种庄稼,夏日里雨水多,那些水稗草、毛小狗和一些不知名的杂草长得也旺。到了目的地,小后生们把缰绳在牲口的脖子上一绕,随它们去自由自在地啃食杂草,他们则拿上镰刀边割草,边看着牲口吃草。看到牲口到了庄稼地边,就挥着镰刀一吆喝,或扔块土坷垃,那马啊、牛啊就扭头回来了,不听喝的就过去牵回来,有时还会在牲口身上捶两下。我则乖乖地牵着缰绳跟着驴,生怕驴吃了旁边生产队的庄稼或跑了。后来熟悉了,我们也带上镰

刀、绳子,边放驴边割草,一天下来,也能割几十斤。

夕阳西下时,驴儿马儿吃得滚肚溜圆,我们就收工了。把一堆一堆的草收起来,放在铺好的绳子上,捆好,放在马背、牛背、驴背上,望着蓝蓝的天空和朵朵白云,赶着牲口往回走。

累了一天的牧童们就骑在了牲口背上。小后生们骑上了高头大马,踏着乡间的石子路,“咯噔咯噔”的挺神气。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,把驴牵到田埂旁,站在田埂上跨上驴背。牲口都没有鞍子,光光的驴背上骑不好就会滑下来,感到很紧张,有时索性趴在驴背上,其实挺难受的。慢慢胆也大了,掌握了平衡,骑在驴上,把草捆揽在怀里,随着驴的走动一颤一颤的,优哉游哉,有时还跟着马儿在乡间小道、青纱帐里,“滴滴哒哒”跑几步,一天的困乏早已跑到了九霄云外。

临近村口,我们就要下驴步行,队干部看到骑牲口,那是轻则挨骂,重则要扣工分的。回到生产队,把驴交给饲养员,拴在马厩里。割下的草,过秤后交给生产队。草是按斤计工分,我们等于上了一天工,还发了奖金,虽说累,但很开心。

我曾戴过绿军帽

我没有当过兵,也没有穿过闪耀着军人风采的国防绿军装,却戴过一顶国防绿军帽,并引以自豪了三个多月。

那是在上世纪70年代,灰蓝两色统治着人们的服饰,而国防绿作为军人的象征,已经开拓了服饰的流行色。人们千方百计搞到一身军装穿在身上引以为荣,穿不上军装就戴一顶军帽也觉得头顶生辉。

那时的军帽称之为“解放帽”。那时,我刚刚来到太钢工作,同样被国防绿流行色所吸引,期盼能穿上一身军装,抑或戴一顶国防绿军帽。

那时的商店是买不到解放军军装的,倒是有卖军帽的,我便买了一顶绿军帽戴上。戴了没几天,就有人指出我戴的军帽是假的。我不服气,问他,你凭什么说我的军帽是假的?他一针见血地指出:真的军帽是的精良面料,帽檐尖挺,里面有一块长方形的印章,标着姓名、年龄、血型、部队编号,你看一下有没有印章?我摘下军帽看了看,军帽里子白白的,没有印章,我买的军帽是假的。

我有点沮丧,就问他,去哪儿买盖印章的军帽?他说真军帽是买不到的,只能去部队里找。他的话提醒了我。我们小组有几位从部队复转回来的退伍军人,我们称之为“老转”,我就缠住他们要军帽。他们有的说还留恋部队的生活,想留下军帽做个纪念,所以不能奉送;有的说,军帽已经被别人捷足先登了,早被人家戴到头上了。有一位“老转”被我的诚意所动,终于从他的战友处找回一顶盖着印章的正儿八经的国防绿军帽。

我喜滋滋地戴上国防绿军帽,尽管军帽不是新的,但它却经历了这位解放军战士的军旅生活,彰显了军人的威严与气质。

三个月后,一位发小见我神气地戴着国防绿军帽,就羡慕得直流口水,缠住我想戴几天军帽。我也舍不得,可耐不住他的纠缠,只好把军帽借给他。我告诉他,两个月后必须还我。他高兴地戴上军帽走了。

两个月后,发小光着头来到我家,他沮丧地说,他刚处了一个对象,对象的弟弟看到他戴着军帽,就把军帽戴到自己头上了。发小苦着脸说,你说,我好意思要回吗?

我有点生气,但很快就释然了。能帮助发小处对象,我做一点贡献也是应该的。

难忘时刻

胡兆喜

骑车子卖冰棍

清楚记得初中毕业的那年暑假,父亲把他心爱的坐骑——攒了好几个月薪水才买下的永久牌自行车,交给我,又精心制作了一个木箱子,母亲则用纱布缝制了一块四方的棉絮褥子,这样,我便开始了骑车子卖冰棍的暑假生活。

清晨,我和三叔骑车进城批发冰棍,回程路上,我们分头走村串户,一路叫卖。虽然三叔早就告诉我卖冰棍的一些方法,怎样叫卖,怎样灵活处理已融化了的冰棍,但毕竟是新手,每次三叔早早地卖完冰棍,而我只卖了一半左右。此时,三叔就叫我在村头树荫下休息,他则骑上我的车子去叫卖。慢慢地,我也掌握了卖冰棍的一些窍门,也敢放开喉咙叫卖:“冰棍、冰棍,糖水5分,豆沙一毛!不冰不甜不要钱哟!”

一般情况,早晨出门,午后就能卖完回家吃饭。一箱大约能盛200支冰棍,卖了也能赚五六元钱。虽然自己卖冰棍,但我们是舍不得吃上一支的,带着一壶凉水,路上就可以解渴了。

炎炎夏日,走村串户卖冰棍的人很多。也曾遭遇被同行挤兑的时候。人家说,这个村子是他的专卖点,不允许我进村叫卖。望着对方强壮的身体,以及一脸蛮横相,我只好忍气吞声调转车头,朝更偏远的村庄跑去。偶尔,也会有撞到同学的尴尬时候,自己总会羞得脸颊火辣辣的烫,但同学却很热情地满村吆喝人家来买我的冰棍。

在三叔的鼓励和呵护下,我坚持卖了一个暑假的冰棍。虽然被烈日晒黑了皮肤,也曾被暴雨淋成“落汤鸡”,被同行欺负过,甚至还被狗撵咬过,但看到一布袋零碎的硬币、纸币,心中还是像吃了蜜似甜滋滋的。父母没有让我上交劳动所得,而是叫我自己支配这笔劳动财富。我置换一套很时尚的“行头”,还买了一块让身边人很是羡慕的手表,焕然一新地进城去读书。

